



郭守敬的守道与敬业

□ 崔 庆

成宗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，元朝政府颁布诏书，官员年满70岁可以退休，掌管太史院的昭文馆大学士郭守敬时年已经73岁，申请退休却不被批准，他还要为朝廷效力10余年。郭守敬于而立之年才正式参加水利工作，职业生涯长达55年，但他的传奇不止于时间，更在于执着精神，业精于敬，道守于一，淡泊名利之间成就济世惠民之功。

学有所长

郭守敬从小深受家学熏陶，在祖父郭荣的教导下，好学不倦、刻苦钻研，尤其表现出对于器械制造和工程设计的极大兴趣。有一次，郭荣的好友子聪和尚来访，两人切磋学问，热烈讨论一种已经失传的计时器“莲花漏”。年仅15岁的郭守敬在旁聆听，根据两位长辈手中的拓片，开始钻研“莲花漏”结构并试图仿制，子聪和尚深以为奇，将他收入门下。子聪和尚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秉忠，不仅是

元朝的学术大神，也是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的朝廷重臣。郭守敬在恩师的精心培养下，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，和张易、张文谦、王恂一起成为邢州学派的代表人物。

郭守敬精通水利，很早就崭露头角，21岁时修复了家乡邢州城北的达活泉石桥，并疏浚了达活泉、野狐泉等河道。他勤于思考，对待水利工作一丝不苟，尽可能实地勘探研究，对于水文、地理、工程的精准把握，令人叹服。元成宗大德二年（1298年），朝廷讨论铁锚竿渠工程。郭守敬认为此地为山区，大雨时水流汇集很快，建议干渠宽度应在50步至70步之间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方案没被采纳，实际施工中干渠只挖到原定宽度的2/3。第二年，大雨来临，水渠行洪不畅，造成了巨大损失，元成宗十分后悔没听取郭守敬的建议。“料事如神”来自于精深的专业造诣和严谨的科学精神，郭守敬终生对此孜孜以求。

专心谋事

业精于敬，无论跨度有多大，真正的“劳模”对于工作总是充满了淳朴的敬意，每一个岗位都是修炼自身、回报家国的入世之缘。郭守敬涉足的工作领域广泛，不仅仅有水利还有天文，但无论干哪一行，他都干得十分出色。郭守敬年轻时主要从事水利工作，35岁任都水少监，41岁任都水监。人过40不学艺，然而人至中年的郭守敬，职业生涯却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公元1275年，都水监并入工部，45岁的郭守敬任工部郎中，参与编制《授时历》，从水利领域一下子跨界到了天文领域。郭守敬迅速适应了新岗位，数年苦功，到公元1280年，新历告成，定名“授时历”，郭守敬也正式就任太史令。“授时历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准确的历法，在中国沿用了300多年。

郭守敬似乎“官运不佳”，41岁任都水监，到了61岁再次就任都水监，辛苦工作20年，虽然岗位多变，但是级别一直未变。在这期间，郭守敬完成了包括“授时历”在内的多项重大任务，作为刘秉忠的爱徒，又深受朝廷信任，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也十分赏识他，若想谋取高官，“跑跑动动”应非难事。但是，郭守敬心里好像只有工作，在乎的是做事的机会，毫不

在意官有多大。

无论在哪个阶段，郭守敬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始终充满了热情。1291年，耳顺之年的郭守敬向忽必烈上书，不是“要官”，而是“要工作”，陈述水利十一事，建议开凿通州、大都之间的运河。在旁人看来，这可能是“自找苦吃”，但是郭守敬考虑的是国家心脏地带的粮草转运大事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郭守敬满怀工作豪情开始主持修建通惠河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居然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。

匠心永在

道守于一，有一则定，坚守原点，可以获取平静和动力。圆满完成了举国关注的通惠河工程后，郭守敬的人生达到了巅峰，技艺精纯、臻于化境，世间似乎已无难事，如果还有，那就是少年之梦“莲花漏”。

50年前，祖父与恩师刘秉忠坐而论学，“莲花漏”拓片深刻脑海，那是梦想起航的地方。俯仰之间，白驹过隙，虽已功成名就，苍苍老者依然激荡心怀，他要用所学所思圆就萦绕心头的少年之梦。公元1294年，在通惠河竣工仅仅一年之后，郭守敬成功研制出了大明殿灯漏，这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。《元史·天文志》中描述大明殿灯漏巧夺天工，以水为动力，有12个木人可以自动报时，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可谓独占鳌头，这或许就是复活的“莲花漏”。

郭守敬的回归之路不止于儿时梦想，更加体现在对工作品质的极致追求，年龄愈大愈加严格地审视自己，还有哪里做得不足。公元1311年，郭守敬81岁高龄，他想到了凝聚毕生心血的通惠河，检视这条为国服务近20年的“大动脉”是否还有疏漏之处。当年修建通惠河，24座水闸的闸门都为木质，材质容易朽烂，郭守敬再次上书，建议将通惠河所有闸门全部更换为石质闸门，以为长久之计，拳拳之心，情真意切。

邢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才德兼备，其中多人后来都身居高位，相比之下郭守敬的官位不显。但郭守敬一生专注本职工作，屡屡主动承担艰巨任务，无不精益求精，反而成为了邢州学派中最为后人所知的代表。

家书中的勤奋观

□ 石志刚



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都需要勤奋，才能获得成功。张永明在《家训》中指出：“天下之民，各有本业。曰士，曰农，曰工，曰商。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；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穡；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；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货财。此四者，皆人生之本业，苟能其一，则仰以事父母，俯以育妻子，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

明代有个官员叫刘崧，出身贫寒，但是喜好读书，用力甚勤。“家贫力学，寒无炉火，手皲裂，而抄录不辍。”为学，刘崧能够做到勤奋；为官，刘崧亦能做到勤苦。刘崧被授予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奉命去镇江收购粮食。刘崧来到镇江后，了解了朝廷在镇江收粮食会加重当地百姓负担，于是“崧力请得少减”。担任北平按察司副使期间，“轻刑省事，招集流亡，民咸复业”。此后，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能做到勤于政事。等到他退休后，朝廷非常想念他，拜其为司业，“赐鞍马”，“令朝夕见”，与其见面后热切聊天交流，只是他不到10天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仍然谈论着国家大事，而没有涉及家事。“刘子高（刘崧）勤国初，匪止以清介闻也。”

士农工商，首先是读书人，他们通过勤奋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，已经被很多古代读书人作为人生信条。“家族兴旺书为本，祖宗业盛源自勤。”刘崧的人生履历就是生动的说明。至于从事农工的人，起早贪黑，更是需要时间、精力和辛勤地付出来得到回报。浙江金华卢氏家训中强调：“凡我族人，必先勤农工，务根本，保衣食，求发展。各业善艺，务求精深。”商业的经营，如果没有勤奋作为支撑，亦是较难维持的。勤奋勤劳对于通过商业致富的人亦是十分重要的。

不同行业的人，要想获得成功，均离不开勤奋，这里的勤奋多指尽力而为。除了尽力而为之外，还有尽道，遵循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。何士晋在《宗规》中说：“士农工商，所业虽不同，皆是本职。勤则职业修，惰则职业堕；修则父母妻子，仰事俯育皆有赖。堕则资身无策，不免嫫笑于姻里。然所谓勤者，非徒尽力，实要尽道。如士者，则须先德行，次文艺，切勿因读书识字，舞弄文

法，颠倒是非，造歌谣，匿名贴。举监生员，不得出入公门，有玷行止。士宦不得以贿赂官，贻辱祖宗。农者，不得窃田木，纵牲畜作贱，欺赖佃租。工者，不得作淫巧，售敝伪器什。商者，不得纨绔冶游，酒色浪费。”士农工商都有各自的“道”，如果想在各自行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和较大成效的出现，必须遵守带有规矩性质的“道”。

古人家书中的勤奋观还强调专注与持久，如果短时间内做到勤奋，可以获得一时成功；如果长时间内做到勤奋，就可以获得长期成功。叶梦得在《石林治生家训要略》中说：“昔东坡曰：‘人能从容自守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成？’今后生汲于谋利者，方务于东，又驰于西，所为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人之所以此破家者多矣。故必先定吾规模，规模既定，由是朝夕念此为此，必欲得此，久之而势我集、利我归矣。故曰：‘善始每难善继，有初自宜有终。’”北宋名臣韩琦可谓专注于政事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勤政。他考上进士后，监左藏库，认真管理仓库，严格货物查验和监督制度，作出了政绩。后在朝中担任右司谏，“凡事有不便，未尝不言，每以明得失、正纪纲、亲忠直、远邪佞为急，前

后七十餘疏”。从中，可见韩琦的勤政程度。

朝廷派韩琦担任经略安抚、招讨使，因其考虑周详，屡挫敌人。后与范仲淹抵御西夏，“名重一时”，“人心归之”，“朝廷倚以为重”，“故天下称为‘韩范’”。直到元昊向宋称臣，韩琦看破元昊提出的称臣条件，提出解决该问题的“七事”：一曰清政本，二曰念边计，三曰擢材贤，四曰备河北，五曰固河东，六曰收民心，七曰营洛邑。其忧国之心、勤政程度亦可窥一斑。韩琦在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三朝担任过宰相，后辞去相位，坐镇地方，继续为民任政。

韩琦移判大名府，因大名府人口众多，政务繁多，所以比其他地方付出要多。当时，韩琦虽然已经年过60，但是仍然事必躬亲，勤政为民。韩琦后来移判相州，仍然坚持为民原则，深受百姓拥戴。相州百姓“人爱之如父母，有斗讼，传相劝止，曰：‘勿扰吾侍中也’”。韩琦勤政有一个特点就是“知无不为”。有人鉴于此，向他提建议：“公所为诚善，万一蹉跌，岂惟身不自保，恐家无处所。”韩琦回答：“人臣尽力事君，死生以之。”欧阳修称赞他：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。”

清代“双面人”于敏中

□ 东 力

桂迎奉献媚、极尽能事，全权代理于家的基建工程，原来一万两白银的预算到底花了多少钱，又是一笔糊涂账。一朝宰相，家资巨富，求田问舍，可谓斯文扫地！乾隆帝震怒之余，将章攀桂革职，但仍然保全于敏中的声誉，既往不咎。200万两白银酌情留给其后代3万两，其他绝大部分充公，几乎是一次不留痕迹的“抄家”。

大事糊涂

于敏中出身于名门望族，祖上世代为官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弱冠之年，24岁就状元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名动一时。于敏中小乾隆帝3岁，年龄相仿，神思相通，才能出众，加上其记忆超群，思虑周详，近侍王驾，勤慎练达，深得乾隆帝赏识，屡得升迁。乾隆二十五年，于敏中任军机大臣；乾隆三十年，擢户部尚书；乾隆三十三年，加太子太保；乾隆三十六年，升为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；乾隆三十八年，晋升为文华

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，仅次于舒赫德的军机大臣。于敏中还因在平定第二次金川之乱中贡献突出，获赏一等轻车都尉，乾隆帝特将其画像绘于紫光阁中。

于敏中位极人臣，无论是内朝谋划，还是巡幸在外，成为御前须臾不可离开的显赫人物，朝中许多重要决策出自其意，“不是首席、胜似首席”，成为朝中实际的第一重臣，而其“双面”之像也隐隐而现。于敏中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的第二年，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事发，在审讯治罪过程中，高云从交代了曾私下结交于敏中，互有利益交换。内廷近侍勾连外朝重臣，向来是为大忌，乾隆帝更是震怒，当面质问于敏中，此后还下诏书深责。于敏中每日都陪王伴驾，还要向内侍打听皇帝一举一动，一是知错犯错，二是其心叵测。于敏中虽因协助统筹金川战役，被从宽处理、留任原职，其心性已可见一斑。其实，早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于敏中嗣父、生母相继病故，他为早日返回朝廷，将“两次亲丧，蒙混为一”，聪

明人算起了“糊涂账”，已经引发时人侧目、御史弹劾，但还是因其才能留任，还很快擢升户部侍郎。这看似是天大的侥幸，实则是危险的开始，德不配位，终将反噬其身。

始作俑者

于敏中身后，不仅家事如麻，身前不端之举经多年发酵，也开始频频爆雷、风波不断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甘肃冒赈特大贪污案件事发，其涉案金额之巨、牵涉人员之广、潜藏时间之久，都令朝野震惊。甘肃原布政使、后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处斩，陕甘总督勒尔谨自裁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绞刑，先后正法者56人，甘肃官场“为之一空”。随着这起空前巨案被层层剥笋，条条线索都指向一个幕后之人，那就是于敏中！乾隆便立刻觉察出，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表面看是王亶望，而实际幕后黑手正是于敏中。

甘肃冒赈案缘起于“捐监”，即上交一定粮食获得国子监监生资格，此



事容易弊端丛生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甘肃开捐之前，朝廷曾有过激烈争论，首席军机大臣舒赫德极力反对。然而，负责户部工作的于敏中极力主张批准甘肃“捐监”，在其坚定支持下，王亶望在甘肃推行“捐监”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朝廷专门检查甘肃“捐监”情况，甘肃官员上下串通、蒙骗过关，显然是于敏中授意他人之为提前通风报信，于敏中俨然成为王亶望的“保护伞”，王亶望因此有恃无恐，从“捐监”谋利长达7年，甘肃官场风气也为之败坏，终酿成罕见的腐败塌方大案。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于敏中到达职务顶峰，接替的是刘统勋之位。刘统勋为官数十年，始终清廉正直、敢于直谏，“得古大臣风，终身不失正”。于敏中虽有才能，然则藏污纳垢于内，利益勾连于外，“颇有簠簋不饰之议”。在于敏中后，和坤同样才高德失，官场风气一坏再坏，以至于难以挽回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乾隆帝由明朝权奸严嵩联想到于敏中，推断“于敏中拥有厚资，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贿”，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，至此名臣的人设彻底崩塌。